



社会经济史译丛

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

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

Via Peking back to Manchester:
Brita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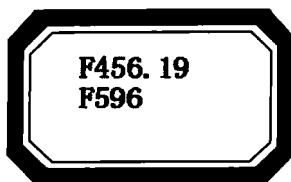
[荷] 皮尔·弗里斯 著
苗婧 译

19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社会经济史译丛

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

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

Via Peking back to Manchester:
Brita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China

[荷] 皮尔·弗里斯 著
苗婧 译

F456.19
F596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 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 / (荷) 皮尔·弗里斯著; 苗婧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10

(社会经济史译丛)

书名原文 Via Peking back to Manchester: Brita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China

ISBN 978 - 7 - 308 - 07131 - 4

I. 从… II. ①弗…②苗… III. ①产业革命 - 研究 - 英国
②工业化 - 工业史 - 研究 - 中国 - 清代 IV. F456. 19 F429. 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8479 号

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 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

(荷) 皮尔·弗里斯 著 苗婧 译

责任编辑 赵 琼

装帧设计 丁 丁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34 千字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7131 - 4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总 序

就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中文与外文（主要为英文）学术圈各自相对独立，尽管现在信息交流与人员往来已经较为频繁，两个学术圈有所交叉，但主体部分仍是明显分离的。相互之间对彼此的学术动态可能有所了解，但知之不详，如蜻蜓点水，缺乏实质性的深度交流，中外学者在这方面都颇有感触。而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更为有限。关于海外中国研究、外国人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制度经济学等，由于相关译丛的努力，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中国学术界。由于欧美、日本与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日趋成熟，其前沿性成果更需要我们及时获知，以把握当前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动态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研究中国产生了兴趣，一则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一则因为如果不了解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度的历史，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人类发展，他们希望与中国学术界有更多的交流。

就有关中国的史料与数据而言，中国学者对英文的原始史料涉猎有所局限，遑论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等，这些语种中有关华人与中国的记载，是在中文正史与野史中几乎看不到的世界。而这些史料，在中西方的比较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领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待开发的史料还有域外汉文文献资料，包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地的汉文古籍，以及东南亚、美国等地华

人的文献与文物。仅从这个角度而言，引介和翻译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显得日益重要。就学科而言，由于专门化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各学科形成自身的特定概念、范畴、话语体系、研究工具与方法、思维方式及研究领域，对此但凡缺乏深入而全面的把握，相关研究就很难进入该学科体系，而其成果也难以获得该学科研究人员的认可。而专业人才培养、评审与机构设置等制度更强化了这种趋势。专门研究是如此精深，以致许多学者无暇顾及与其他学科与研究领域，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学术视野因此受到局限，甚至出现学科歧视与偏见，人类追求知识的整体感与宏观认识的需求亦得不到满足。

同时，不同学科的一些特定话语和方法，其实许多是可以相通的，学术壁垒并非如想像中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旦打通障碍，架起沟通的桥梁，游走于不同学科之间，其收获有时是令人惊喜的，原创性的成果也常在跨学科的交叉中产生。如从历史源头与资料中原创出经济学理论，或以经济学方法与工具研究历史问题获得新思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弗里德曼、哈耶克、库兹涅茨及为人熟知的诺斯、福格尔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因此，“社会经济史译丛”的宗旨与取向为：第一，在学科上并不画地为牢局限于经济史和社会史，也将选择与之相关的思想史、文化史，或以历史为取向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成果，更欢迎跨学科的探索性成果。第二，在研究地域和领域的选择上，将不局限于译者、读者、编者和市场自然倾斜的中国社会经济史，本丛书将力推西方社会经济史的前沿成果。第三，译丛除一般性论述的著作外，也接受史料编著，还精选纯理论与方法的成果。在成果形式方面，既选择英文著作，也接受作者编辑的论文集，甚至从作者自己的英文论著中翻译或加工创作的中文成果。在著作语种的选择上，除英文作品外，还特别扶持其他语言论著的中译工作。

我们希望本译丛成为跨越和沟通不同语种成果、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学科与中外学术圈的桥梁。

龙登高

2009年5月于清华园

中文版序言

现下已被翻译成中文的《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一书是 2001—2002 年写成的，距今已隔几年光景。读者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中文版本与 2003 年出版的英文版本完全一致，没有进行任何的修订或是扩充。实际上，答案非常简单：目前材料的搜罗积累和分析整理尚未成熟，而我对重新撰写客观系统的综合分析的灵感也稍显不足。考虑到近来全球经济史学家在新数据和新见解方面的新进展，这就更是必须的了。在我看来，将同一文章稍加增补、略为删节便付梓出版并无多大裨益。如此“改进”的文章相较于原来的版本，很可能欠缺客观性与连贯性。同时，在此书的完成以及创作过程中所遇到的某些问题，我认为需要进一步阐述。简要地说明一下我继此书之后围绕大分流问题所发表的论述，可能会让大家对后续研究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印象。

重新严正审视一部作品常常源自评论所提出的挑战。就我个人情况而言，理卡多·达彻斯尼（Ricardo Duchesne）发表在 *World History Connected* 的深度评论需要我作出回应。借助回应的机会，我尝试着对达彻斯尼提出的批评以及他的误解^①，进行了更加明晰而详尽的论述。如同达彻

^① Ricardo Duchesne, “Peer Vries, the Great Divergence and the California School: who is in and who is out?”, *World History Connected*, an E-journal, vol. 2 issue 2 (2005). 我在同期杂志中作出了回应，见 “Is California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global: a rejoinder to Richardo Duchesne”。

斯尼所指出的，末尾我所列的书单针对的是加州学派修正派的意见，该派的代表为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Roy Bin Wong）、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Marks）、丹尼斯·弗林（Dennis Flynn）、阿图罗·吉拉尔德斯（Arturo Giráldez），以及创造了“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这一术语的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这些作者大都不再使用“西方的崛起”（Rise of the West）这一术语来论述西方长时段“独特”（exceptionalism）历史的必然结果。与之相替代的，在分析西方经济占主导的发展态势时，他们大多使用“大分流”这一概念。他们认为这种主导地位在历史上出现得相当晚，时间为18世纪后半期甚至更晚，而且是极为幸运的偶然事件的结果。他们极其反对西方独特性的提法，在他们看来，这是由于西方特别是英国非常幸运地拥有煤矿和殖民地的缘故。这些条件使西方经济体得以逃脱马尔萨斯陷阱，该现象在所有前工业经济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

从逃脱马尔萨斯陷阱的角度来审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非史无前例，实际情况也远非如此。然而从未有人对此进行过像英国历史学家托尼·赖利（Tony Wrigley）那样体系严密、分析提炼式的论述。^① 我认为他的解释言之有理、论证充分，加州学派将他的观点引入全球经济史领域的确值得称赞。煤的作用，尤其是作为蒸汽机能源，是人们理解工业革命是一次全球经济史革命的关键之所在。我曾就此问题发表过一篇文章：“为何马尔萨斯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工业革命”^②。文中，我对比了世界不同区域的能源体系及其历史，并从全球能源的视角对工业革命加以审视。能源，或者概括地讲，资源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绝对不能被解释为：单凭获得了这

① E. A. Wrigley, *Continuity, chance &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 1988) .

② 最初的荷兰语题目，请阅读 Peer Vries, “Hoe Malthus, uiteindelijk, ongelijk kreeg. De Industriële Revolutie in Engeland als het doorbreken van het Malthusiaans plafond”, *Leidschrift*, vol. 18 issue 2 (2003): 109 – 167.

种资源便足以为一个国家创造财富并维系其繁荣。这一点在我对彭慕兰《大分流》一书的评论中就已经强调。此后，我更加坚信这一观点。在开采技术落后、组织乏力的情况下，英国的煤炭仅只是一种化石。英国之所以“拥有”殖民地，是因为她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去征服、维护和开发殖民地。^① 在大英帝国构建的特殊政治经济——军队帝国的过程中，一旦离开了英国的创造生产，其结果是无法想像的。这一论述是我自2003年以来，就“加州范式”发表的各种批评分析的基础。我把关注集中于该种方式与我自身方式的不同，但并未否认加州学派著作的重要性及其价值。

当前大分流的相关争论以及加州学派在争论中所持的立场，必须放在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和当代经济增长起源的特殊性这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大背景下才能加以理解。应邀为《牛津历史写作》(*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撰写一篇全球经济史文章，这为我提供了从该学科领域审视历史的契机。然而这篇很久之前完成的文章并没有发表。得以发表的文章篇幅更长，但讨论的是同一论题，刊登于《奥地利史学杂志》(*Austrian Journal for History*) 全球史的特别期刊中。^② 在此广阔背景下，将加州学派的方法同其他(全球)经济史的方法加以比较，人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加州学派极大地丰富了这场争论，他们某些主要的论点是正确的。然而，必须加以补充的是，其中不乏谬误之处，所选取的角度也有不足之处、偏向性和盲点。在维护自身立场、攻击对方观点时，加州学派同大多数修正主义者一样，倾向于诉诸特例。

在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③，我分几个方面对他们的方法进行了分

① Peer Vries, "Are coal and colonies really crucial? Kenneth Pomeranz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2 issue 2 (2001): 407-446.

② Peer Vries,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a survey",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Austrian Journal of History*.

③ Peer Vries, "The California School and beyond: how to study the Great Divergence?" *Journal für Entwicklungspolitik/Austr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4 issue 4 (2008): 6-49.

析和批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已经提到过，即加州学派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世界各国在推动、协助、忽视、阻碍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管怎样，他们忽视了中国与西欧，特别是与英国在现代社会早期的根本差异。人们至少应当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当时中英两国在组织、力量、目标、手段和政策上的巨大差异可能具有怎样的意义。我已经在一篇文章中比较了这些不同之处，该文就西方崛起过程中国家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分析，其中还涉及一些像印度莫卧尔王朝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情况。^① 在《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一书中，国家的作用再次被强调指出。然而鉴于这个话题的非凡吸引力，加之在我看来它非常不被加州学派看重，因此这个话题成为我的一本重要作品——《一个有着惊人差异的世界：近代早期西欧和中国的国家与经济》（即将出版）^② 的主题。书中，我分析了中英两国基础结构的“硬件”设施：双方的金融财政状况、政府机构设置、军队组织情况以及政策方针。正如该书题目所指，其差异是令人吃惊的。同清代中国相比，英国政府在基础结构上拥有更为庞大的权力。英国有着更多的收入，可以支付更多，拥有更为高效的税收和财政体系，更好的货币体系，以及债券体系，这是清政府所缺乏的。坦率地讲，在 19 世纪 50 年代之前中国是根本没有这些的。英国拥有更为高效的政府机构和陆军，以及当时世界上最为高效的海军。英国中央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完全不同于当时清政府典型的农业家长式制度。

国家政府可以被描述为一切制度背后的制度。但在加州学派看来，制度显然是无关紧要的。彭慕兰没有看到近代早期的西欧和中国在制度上的根本性差异，至少没有看到导致西欧工业化的根本差异。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一书中断言，制度仅仅是经济结构的现

① Peer Vries, "Governing growt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rise of the West",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3 issue 1 (2002): 67-138.

② Peer Vries, *A world of surprising differences: State and economy in early modern Western Europe and China* (Leiden, forthcoming).

象。王国斌承认清代中国和西欧有着各种各样、颇具差异的制度，但他仍坚持认为这并未造成两者很大的不同，至少在工业革命之前没有。^①就我个人而言，这些主张很难令人接受，我已经开始争取系统地对其进行反驳。

文化同样是大多数加州学派作品中的盲点，戈登斯通和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部分作品是例外。在戈登斯通的作品中，科学技术总是深深植根于文化土壤中，占据中心地位。霍布森同样关注西方思想，但是他仅仅指出其日益趋向种族主义这一事实。在彭慕兰的大分流中，文化是完全缺位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也是这种情况。^②把文化引入争论之所以存在着深深的顾虑，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担心出现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至少是担心，当声称可能存在有利于西方文化的某种差异时，被人视为欧洲中心主义。弗兰克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声称在文化或者制度方面一旦涉及欧洲的独特性（exceptionality），就暗示着某人的种族主义思维。^③其次，可能仅仅是由于，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声称自己是自然科学这一硬性科学的从业者；对处理文化这样一个软性的，在他们看来属性“模糊”的概念犹豫不决。我个人并不是近代早期西欧文化方面的专家，更不用提中国方面的情况了；但是我坚持这样一种观点，相对于大多数加州学派相当注重物质的著作，在经济史研究中更多地论述文化和制度的作用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应当的。因此，在此书的酝酿构思过程中，我

① 可以参见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2000), Part One;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1998), e.g. p. 206; Roy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and London, 1998), p. 151.

② 参见 Jack A Goldstone,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ss. forthcoming”; John M. Hobson,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Cambridge, 2004). 对彭慕兰和弗兰克的论述参见 p. iv 注②提到的文章。

③ Frank, *ReOrient*, p. 4.

写下了一些对该论题的大致看法。^①

同样我发现，在加州学派的作品中缺少对实际生产过程的深入分析。加州学派倾向于关注交换关系以及生产活动的总体结果。实际生产了什么以及如何生产，某些生产过程可能具有的路径依赖及其潜在的可能性和困难，都需要多一些的关注。主张所有前工业化社会最终基本上是马尔萨斯式的观点当然是正确无误的，然而同样要在此指出的是，我认为应该对中英之间的主要差异及其重要性给予更多关注。大家可能会想到，雇佣劳动和规模经济的重要性、物力资源和生产工具的使用、乡镇间的劳动分工以及城市化水平等。持续不断的可观经济增长，例如，现代经济增长，从来就不仅仅只是依赖单纯的积累，拥有煤矿、殖民地，或是拥有黄金白银；而是有赖于生产，产品组织结构和创新。我曾在一本小篇幅的书中，尝试就一项具体产品对该问题进行论述，该书题为《茶的政治经济史——茶向我们诉说的中英近代早期经济》^②。该书的出发点是在中国农业、主食和经济作物中，家庭生产方式所占的主导地位。清代的生产大多是家庭式的，每个家庭有一小块土地，伴随农业生产的还有男人们的其他户外劳作与女人们的各种家庭内部生产。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清代中国本土，还适用于长期以来从属于这个帝国的地区。这些区域的经济并不从属于中国内陆中心，也没有像英国边缘区域那样，受中心地区影响而发生转变。像茶、糖、烟甚至棉花这些在全球史中常常被视作农民种植的经济作物，并几乎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作物产品这一点上，这些国家也深受清代中国的影响。在这方面，英国的情况截然不同。英国农业逐渐由雇工劳动、使用畜力和各种工具的大农场控制。英国人尽可能地将经济

① Peer Vries, "The role of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can economics be of any help?" *NEHA Jaarboek*, 64 (2001): 28 - 60. <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economicHistory/GEHN/GEHNWorkshops.htm>.

② 该书以德文出版，题为：*Zur politischen ? konomie des Tees: Was uns Tee über die englische und chinesische Wirtschaft der Frühen Neuzeit sagen kann* (Vienna, 2009)。

作物引入他们的殖民地。如加勒比的糖、北非殖民地的烟和棉花，以及后来引入印度和锡兰的茶。在这本书里，我对茶进行了集中论述，并再一次证明中英两国之间并没有如加州学派所声称的那么多相似之处，而且早在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前，两国就已经步入了大不相同的发展轨道。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愿意像加州学派那样，将清代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庞大市场的经济体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①

总而言之，我强烈地反对由许多加州学派学者提出的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声称清代中国本可成为近代早期全球经济和世界白银吸纳中心（silver sink）；因为我坚信，该观点简直无法自圆其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清代中国本可成为近代早期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本可凭借自身极为高效的工业生产而吸引全球白银流入。弗兰克使用了弗林和吉拉尔德斯关于全球白银贸易的数据以及中国的白银进口数据，将这一观点通俗化并得到不少人的支持。^② 我曾在不同场合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评。^③

大分流的研究努力是令人着迷的，而且真正的争论才刚刚开始。这将得益于众多中国学者的参与，以及中西学者之间更多的直接讨论。我希望此次译作和将来的翻译成果能够对这种讨论商榷和交流合作有所贡献，并对进一步的拓宽和深化有所裨益。举例来讲，我个人期待从英国、中国和日本在漫长的 18 世纪的比较分析以及对近代早期全球贸易关系的系统分析中获得非常有趣的结果。我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完成这些论题的原稿创作。

① 我的评论可参见 “In the review of Christopher Mills 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 in Qing Manchuria, 1644 – 1862* (Stanford, 2007), published by EH. NET, August 2007.

② 参见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特别是其中的第三章。弗林和吉拉尔德斯关于全球白银贸易的更多论述，我参考了丹尼斯·弗林的网站。

③ 例证可参见 p. vi 注①提到的作品以及 Peer Vries, “Orientalism Inverted; or Good Reasons not to ReOrient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Paper presented on 21-3-2006 at a GEHN Conference in Villa Les Treilles, France. 副本为作者所有。我计划完成对这一问题的原稿创作。

致 谢

本书是在我正式担任耐梅根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Nijmegen）全球比较史学教授的就职讲座的基础上完成的。讲座的日期是在 2001 年 12 月 12 日，其后扩展成书出版，题名为 *Via Peking terug naar Manchester, England, de Industriële Revolutie en China*（Nijmegen, 2001）（*Via Peking back to Manchester: Brita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China*）。在促进世界史和人类史研究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Study of World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Mankind）的资助下，此书被译为英文，译者为凯特·威廉斯（Kate Williams）。为了更上一层楼，我决定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于是就有了眼下的这部作品。这本书是我在荷兰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所任职期间写就的，得到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WO）的资助。在此，我谨向撰写和出版过程中提供帮助的所有人致以诚挚的感谢。

社会经济史译丛
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主席

吴承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经济史学会前会长

学术委员会委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包弼德(Peter Bol) 哈佛大学教授

包乐史(Leonard Blussé) 莱顿大学教授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陈春声 中山大学教授

陈争平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近代经济史学会会长

陈志武 耶鲁大学教授

科大卫(David Faure)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李伯重 清华大学教授，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

刘宏 曼彻斯特大学教授

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吴松弟 复旦大学教授

萧国亮 北京大学教授

张国刚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唐史学会会长

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 剑桥大学教授

主编

龙登高 清华大学教授

目 录

导言

英国工业革命

- 资本主义的作用 / 8
- 国家的作用 / 13
- 英国：高度市民化的开放社会 / 17
- 文化造成的差异 / 19
- 科学技术的作用 / 20
- 摆脱马尔萨斯理论的羁绊 / 22

东线无战事：关于中国历史的陈规旧说

观察清代中国的新视角

- 资本主义在中国？ / 36
- 告别“东方专制主义” / 53
- 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 / 61
- 孔子无罪 / 64

高生产率，匮乏的科技动力和现代科学的缺失	/ 66
受限于马尔萨斯理论？	/ 78
结论	/ 104
启示	/ 114
参考文献	/ 116

导 言

世界史学家往往有一种倾向，他们格外强调对不同社会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仅仅对单独个案进行考察，无助于研究视角的拓展；反而有可能在立意上削弱趣味性，减少立论和论证的说服力，这在对不同文明的考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一名经济史学者，在专业训练中我始终关注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因。当我对中华晚期帝国史逐渐产生兴趣时，不禁开始思索中英两国历史的比较研究是否有助于理解 18、19 世纪英国^①工业化的原因和发展情况，以及同样的情景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进而言之，我期望通过这种比较研究，能够从宏观角度上揭示工业化进程背后的深层原因。

众所周知，工业化进程最早开始于英国。个中原因依然吸引着众多史学研究专家对此进行研究探索。通过对中英两国的不同文明进行比较分析，我希望能够为这一根本性问题的研究提供新思路，并尝试提出建设性答案。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有关“英国工业革命”的相关史实我无意多加赘言；对那些想要概览英国工业革命全貌的读者，

^① 本文中的“英国”（Britain）指的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相关文献几乎无一例外地仅仅关注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的这两处地方。当涉及英格兰（England）、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和大英帝国（the United Kingdom）时，我会明确地加以指示。